

政策性诱致：一个农村产业创新的解释框架 ——基于 S 省农村农产品创新现象的多案例扎根分析

李凌汉，姜成武

摘 要：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地区出现了由村民自发形成的产业（农产品）创新现象，但现有文献缺乏对中国语境下农村产业创新驱动因素及多因素组合路径的探索。本研究通过对典型村庄（6 个自然村）的实证调研，利用扎根理论方法研究发现，村庄农产品产业再发展双重困境、政策性激励、乡村精英政策感知、政策扶助创新资源整合、创新实现与政策性再扶助五个核心范畴对农村产业创新具有显著影响。在质性研究基础上，利用深度访谈资料进一步探讨了农村产业创新驱动因素间相关关系及逻辑演进路径，并依据研究结果构建了政策诱致型农村产业创新内在逻辑机理模型。研究结论对农村产业创新概念模型研究、创新驱动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及农村产业政策优化研究等具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乡村振兴；政策激励；产业创新；政策性诱致；乡村精英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1)02-0103-16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1.02.010

一、问题缘起：农村产业创新现象的出现

在当代社会，创新是国家、区域或企业提升竞争力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是改变原有经济发展轨道，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有效方式。创新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通过不断提高要素生产率来抵消在生产过程中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导致的要素报酬递减的趋势；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谋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应对由要素或资源的短缺所造成的发展瓶颈^{[1](P3-6)}。在企业（或其他生产组织）生产过程中，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开辟并满足新市场需要或实现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模式，都会改变原有的生产轨道，解决生产要素报酬递减或资源瓶颈难题^[2]。因此，从产业创新的形成过程来看，创新可以认为是一种生产函数的转移或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如果企业（或其他社会组织）实现了通过技术进步、产品设计、生产模式的革新等方式，使创新者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就实现了创新^[3]。在学术文献中，现有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国家创新战略、城市创新政策、科研机构创新机制、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4]，且普遍认为区域产业集聚效应、优势资源吸附与整合能力、生产要素高回报率等都是影响产业创新的重要因素^{[5][6]}。但是在我国农村地区，这些创新所需的条件普遍匮乏，且农户分散经营模式^[7]、土地产权制度^[8]、城市剥夺乡村的制度惯性^[9]等制度性因素，都是造成农村产业创新能力较为薄弱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环境产权论批判”（19FFXB017）；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李凌汉，博士，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lilinghan_qh@126.com（山东 青岛 266071）；姜成武，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 沈阳 110169）

重要因素。

然而研究团队在针对 S 省乡村振兴实证调研过程中，发现近年来有些村庄出现了由农民自发形成的农产品创新现象，并取得了一些创新成就^①。表 1 是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农村产业创新现象及运行基本状况。

表 1 S 省部分农村产业（农产品）创新成果及社会评价

所在地	创新项目	创新项目 开始时间	创新成效	创新产生的社会影响	社会评价
P 市 R 镇 B 村	南果北种、盆景水果	2016 年至今	盆景水果循环种植（葡萄盆景、荔枝盆景、火龙果盆景等）	形成“三代式”持续创新模式（生产一代、储存一代、研发一代）	已申报国家专利
W 市 F 区 W 村	智能种植床	2016 年至今	智能种植床 1 年可以种 16 种蔬菜	实现从地到床蔬菜种植方式的改变	已申请国家专利保护
J 市 R 区 D 村	一料多菇的新技术	2017 年至今	成功研发食用菌新品种，创建一套完整生态循环产业链	由传统农业向“立体生态循环农业”模式转变	获得 S 省农业厅高度评价
Q 市 H 镇 H 村	南兰北种、兰花新品种	2015 年至今	对南方花卉技术改良，研发成功蝴蝶兰新品种	花卉新品种，带动村庄花卉产业大发展	林木良种证

资料来源：村庄农产品创新资料来源于研究团队实证调研，并在调研后就创新情况向当地政府核实。

从上表可以看出，农村产业创新已经在部分村庄出现，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农村产业创新现象是当代我国乡村纵横两向自治结构下，村民自治活力与谋求发展动力相结合形成的新事物^[10]。农村产业创新为农村产业转型、新旧动能转换注入了新动力，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11]，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12]，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重要价值。课题小组在对 S 省农村产业创新持续跟踪调研过程中发现，这种发生于权威型政治特征显著社会环境下的农村地区产业创新现象，较为明显地受到政策性因素显性或隐性的驱动，其创新模式难以利用发端于西方国家、强调市场机制驱动产业创新的模型框架（如创新网络系统模型、区域产业创新系统模型、多部门协同创新模型等）进行合理解释。

针对这一研究缺口，本文试图利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方法，探讨发生于我国本土（S 省）的农村产业创新形成过程的内在逻辑机理。课题小组认为，在有别于西方国家政府行为模式的社会背景下，以我国农村产业创新实践案例分析作为切入点，探讨农村产业创新形成机理的模型，可进一步完善发端于西方的产业创新模型框架，并有助于增强该理论框架的现实解释力。

二、文献回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大量人口和资源向城市集聚，传统农村发展停滞现象日趋严重。观念落后、人才外流、生态破坏、传统文化衰弱都成为影响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日渐式微的农村，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西方学者越来越重视农村发展问题。学术界普遍认为，创新可以激活农村组织内部发展动力，提高农民内生发展能力^[13]，创新也是推动农村摆脱发展困境的有效手段。

^① 研究团队指课题组组建的“农村社会创新与知识扩散”调研团队。团队成员有孙晓娟、黄欣、何彤昕、李一、管贝贝、陆晓丽、池易真等，感谢调研团队在实地调研、访谈资料收集、资料整理过程中的辛勤付出！

产业创新理论长期以来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议题,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在传统创新理论中,学习并渐进创新,是提高产业创新能力的关键,例如干中学模型、用中学模型^[14]。现代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新制度经济学兴起后,学者发现企业制度、国家制度对一国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发现形成了新熊彼特主义(Neo-Schumpeterism)与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理论^[15]。制度(或政策)性因素在影响产业创新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多层级的制度演化^[16],制度(或政策)网络结构间的相互作用,对创新绩效影响显著^[17]。例如,政府的创新补贴政策^[18]、产业扶持政策^[19]、税收优惠政策等^[20],都对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创新产生重要影响。

在农村产业创新影响因素方面,许多学者通过实证归纳出各种因素,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农村产业创新是各种要素的有机组合。农村地区的产业创新行为是由改善农民的福祉所激发的,知识积累、技术革新、人力资本提升等都是促进农村地区创新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21]。例如,Bosworth等通过考察早期欧洲农村地区社区主导的地方发展(CLLD)倡议,认为创新源于新的资源组合(村庄内外部资源整合)^[22]。其二,农村创新是各种社会资源互动合作的结果。村庄通过与院校、地方科技机构、农业经营主体的深度合作,推动农科教、产学研结合是实现农村内生发展和创新要素积累的关键^[23]。其三,国家科技信息系统对农村创新具有正向影响。Wu等分析了1998—2009年间中国国家信息系统、政府主导的研发活动、劳动力流动和农村经济增长的纵向数据,发现国家创新体系(NIS)和政府政策对促进农村创新创业和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24]。

在农村产业创新形成的概念模型方面,可归纳为以下几类。其一,创新网络系统模型。大量科学研究发现,许多产业创新过程伴随着诸如非线性、互动、轨迹、涌现和系统内嵌等复杂性特征^[25]。社会化交互网络系统可以为农村创新提供各种基础性要素^[26]。其二,区域产业创新系统模型。农业创新系统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以省为单位),由农业技术科研机构、政府相关支持部门、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民和企业共同构成的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网络^[27]。其三,多部门协同创新模型。农业创新系统可以视为一个由政府、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农民组织等主体组成的创新活动合作系统。研究表明,农村创新高度依赖于地方性知识积累和社会创新的实际背景条件^[28]。因此,设计一个适当的框架,借助社会各部门支持,可以为农村创新成功实现创造有利条件^[29]。

从以上文献整理可见,产业创新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点议题。许多学者已经对产业创新概念、特征、影响因素、创新系统模型等展开了探讨。然而现有的理论却难以对出现在S省的农村产业创新形成过程进行有效解释。现有的产业创新影响因素或理论模型,主要以创新理论奠基人约瑟夫·熊彼特的思想展开,把产业创新看作是受市场因素驱动,产业结构不断演化升级而突变的过程。因此,产业集群创新理论^[30]、协同创新理论^[31]等源自于国外学者的理论,均关注受市场因素驱动和创新要素在一定区域内聚合、整合,进而实现产业创新(即使涉及创新政策的政府支持创新理论,也主要聚焦以创新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激励企业创新)。但是,现有文献缺乏针对权威型政治特征显著的政府管理体制下,当某领域政策(如乡村振兴)力度加强时,外部政策环境的改变对农村经营主体形成创新激励的研究。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深入调研农村产业创新实践案例,以深度访谈资料和实地调研为蓝本,对农村产业创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思路与方法选择

为了使农村产业创新问题的研究过程更加科学,研究结论更加可信,本研究将采用质性(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全面、详实地探究农村产业创新问题。扎根理论(Ground Theory)自1967年由

巴尼·G. 格拉斯和安塞姆·斯特劳斯提出后，形成多种流派。本文将采用巴尼·G. 格拉斯提出的程序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农村创新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研究思路为：通过对典型村庄进行深入访谈，获取一手质性资料；利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对资料展开质性分析；根据扎根分析结论，提炼影响农村产业创新的基本因素模型，并分析不同因素间的彼此依存关系，系统解释农村产业创新的内在机理。

（二）案例选取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利用扎根理论分析的案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成功实现村庄农产品产业创新的自然村（包括 B 村、D 村、W 村和 H 村）；另一类是邻近产业创新村庄，且村庄农产品规模经济发展良好，但并未实现产业创新的自然村（包括 Y 村和 Z 村）。

原始资料的获取途径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实地调研资料。在调研访谈时，课题组在征求被访谈者同意后进行全程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对录音进行整理，完成访谈记录和备忘录，最终形成 54 份（其中 B 村 31 份、D 村 5 份、W 村 3 份、H 村 4 份、Y 村 8 份、Z 村 3 份）访谈记录，共计 16.7 万字（编号记为 A1—A54）。实地调研村庄 6 个，具体调研村庄名称、调研时间及内容如表 2 所示。

表 2 访谈数据来源

访谈村庄	创新状况	调研时间	调研内容
B 村	盆景水果	2018 年 9 月— 2019 年 1 月	以半开放访谈的形式，采访村支书（兼任合作社领导）、原村支书、镇政府驻村干部、村技术员、合作社成员、普通村民
D 村	一料多菇新技术	2019 年 9 月	以座谈会方式，深入访谈村委会成员、村办企业负责人。电话访谈了该村所在地镇政府工作人员
W 村	智能种植床	2019 年 9 月	以带队参观方式参观了村产业发展状况。以座谈会方式，与该村农产品市场营销部经理 L 及园区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沟通
H 村	花卉新品种	2019 年 9 月	以座谈会方式，深入访谈了村委会工作人员、村办企业工作人员，并参观了生产车间，电话采访辖区镇政府公务员
Z 村	未创新，但村庄产业规模化程度高	2019 年 5 月	以座谈会方式，深入访谈了该村村支书（兼任蔬菜合作社领导），并参观了该村蔬菜种植园区
Y 村	未创新，但村庄产业规模化程度高	2019 年 10 月	以座谈会方式，深入访谈了村委会工作人员。并对该村蔬菜合作社成员进行了一对一访谈

其二是通过查询权威媒体（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的相关报道获得的二手资料，共收集权威媒体专访 17 份（其中 B 村 6 份、D 村 3 份、W 村 3 份、H 村 2 份、Y 村 2 份、Z 村 1 份），共计 4.3 万字（编号记为 B1—B17）。

四、数据分析过程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严格按照多案例分析方法进行^{[32](P20-32)}。首先，基于多案例研究逐项复制（Literal Replication）的需要，选取资料最为充分的 B 村进行单案例分析。其次，在单案例扎根理论分析完成基础上，进一步对成功实现产业创新的另三个案例（D 村、H 村和 W 村）展开扎根分析，挖掘影响农村产业创新的因素及各因素之间内在关联。最后，基于差别复制（Theoretical Replication）的需要，选择村庄农产品产业规模化发展良好，但未实现产业创新的代表性村庄（Y 村和 Z 村）进行译码分析，旨在挖掘与实现产业创新村庄相冲突的要素及关系，从反面印证上一步

的研究结果。通过 6 个案例的逐步分析，并对归纳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修正和发展，进而达到理论饱和。

（一）单案例质性研究过程

在单案例质性分析阶段，本研究选取了 P 市 R 镇 B 村 31 份访谈记录、6 份媒体专访报道进行编码分析。其他村庄资料用以在单案例分析完成后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

1. 开放式编码。开放式编码是将资料分解、检视、比较、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33](P4-12)}。通过资料整理，共形成与农村产业创新相关度较高的 356 条原始语句，对这些语句再次归纳形成 127 个初始概念。为说明研究过程，并节省空间，本文仅截取部分表格作为例证（如表 3 所示）。

表 3 农村产业创新开放性译码

原始语句（案例资料摘选）	概念化	范畴化
书记领导的很好，比邻村都强，哪方面都很好，附近找不出来（这样优秀的人）是不（a04）	书记能力强（A01）	领导者人格魅力（AA01）
他的眼光就特别长远，一个村庄没有一个好榜样，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很难发展，不管创新也好，产业发展也好，人才也好，都与书记有密切的关系（a02）	书记带头（A02）	
用自己本事帮助农民致富，这就是中国党员的本色，就是核心价值观的表现（a03）	书记奉献精神（A03）	
现在农民也讲实惠，希望富起来，老百姓都富裕了，我就高兴（a01）	书记为村民谋福利（A04）	
W 书记每天新闻要看，一号文件农业的文件，下来镇里的文件，他都自己打出来，打出来看（a02）	关注政策（A05）	领导者政策敏锐度（AA02）
在乡村振兴方面，乡村要想发展，就要借力，就是要借政府政策的力量。如果你是单打独斗，没有政府政策的支持，借不上力，很难成功（a16）	争取政策支持（A06）	
正好赶上 2007 年，政府鼓励农民合作社，政策一发布，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大事，这是国家的大事（a05）	紧跟国家政策（A07）	
.....		
合计：原始语句 356 条	概念 127 条	范畴 61 个

注：由于概念支撑原始语句较多，为节省篇幅，每个概念只选择一个原始语句，使用（a*）和（b*）表示，（a*）或（b*）中“*”表示第*份访谈记录或权威媒体专访中的原始语句。初始概念使用（A*）表示，由初始概念形成的范畴用（AA*）表示。

2. 主轴译码。对开放性编码中彼此分割的信息，经过系统分析并挖掘范畴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形成主轴编码。主轴编码可以藉由程序化扎根理论提出的“条件-行动/策略-结果”范式模型（Paradigm Model）将主范畴与副范畴联接在一起^[34]。通过范式模型（Paradigm Model）对 61 个副范畴的有机整理，将其归纳到 14 个主范畴之中（如表 4 所示）。

3. 选择性译码。选择性译码也称核心译码，是在主轴译码所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系统分析后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在本研究中，通过对主轴性编码形成的 14 个主范畴进一步抽象和系统分析，形成 5 个核心范畴（如表 5 所示）。

表 4 主轴译码结果

主范畴	副范畴		
	条件	行动/互动策略	结果
创新型国家	国家创新政策、新旧动能转换	创新政策宣传	地方农创政策
农村发展政策	中央农村发展战略	地方政府农村发展偏好	地方政府支农政策
农业规模化经营	成立农业合作社、村民资金筹措	规模化种植、合作社优势	大宗农产品出口、销售平台
技术积累	技术规范性	技术搜集与学习成本投入、技术跟踪	国外技术引进投入
利润增长困境	市场广阔	市场竞争激励	利润压力
政策敏锐度	政府创新政策	领导者政策敏锐度	创新意愿
创新组织动员	领导者人格魅力、村级组织活力	领导者实干精神	组织动员、科技重视程度
政策性创新资源支持	政策性资金补贴、科技专家支持	新技术专利引进	技术水平提升、资本积累增加
自有创新要素供给	共有资金、乡土专家	技术模仿、人才开发	创新基础要素
政府资助创新平台搭建	政策性项目建设	创新基地、衍生性创新平台	实践中创新
创新理念提升	观念进步、新兴市场洞察	发展模式创新、高端市场出现	新产品研发理念创新
技术改进与新产品研发	前期技术改进经验、新产品专利引进	专利引进与改良	新产品培育
新产品盈利空间	高端需求	新产品梯度开发、高端农产品生产	高端需求创造新盈利、利润率提升
新农村亮点与政策性再扶助	创新亮点	媒体报道、参观考察基地、政府绩效	项目再扶持

表 5 选择性译码形成的核心范畴

核心范畴	主范畴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利润困境	农业规模化经营 技术积累 利润增长困境	政策扶助创新资源整合	政策性创新资源支持 自有创新要素供给 政府资助创新平台搭建
政策性激励	创新型国家 农村发展政策	创新实现与政策性再扶助	创新理念提升 技术改进与新产品研发
村庄领导政策感知	政策敏锐度 创新组织动员		新产品盈利空间 新农村亮点与政策性再扶助

（二）多案例数据分析过程

在完成单案例（B村）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得到了驱动农村产业（农产品）创新实现的基本影响因素。由于仅是针对单个村庄的个案分析，概念与范畴还未能达到相对饱和的状态，同时也存在理论普适性不足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其他村庄产业创新案例进行分析。

在后续案例研究中，选择了3个成功实现农村产业创新的案例，另选择了2个农村规模经济虽然发展良好，但并未实行产业创新计划的案例。通过这5个案例的后续扎根分析，进一步探究决定农村产业创新的关键性因素。对后续3个成功实现农村产业创新案例译码分析得到的新范畴和新面

向如表 6 所示。

表 6 对后续 3 个成功实现产业创新案例译码分析得到的新范畴和新面向

案例	新范畴	新面向
W 市 F 区 W 村	再增产困难 乡村精英介入 技术追赶困境	国际一流技术、蔬菜产业国家标准、产量国际领先（再增产困难），与国外技术差距变小、技术移植适用性难题（技术追赶困境），农村企业家、农民企业家返乡、企业家入股合作社（乡村精英介入）
Q 市 H 镇 H 村	—	增产变难（再增产困难），企业家入股合作社（乡村精英介入）
J 市 R 区 D 村	—	—

注：面向栏中括号内为其对应的范畴。

对后续两个村庄产业规模化发展虽然良好，但未实现产业创新案例的分析，也遵循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步骤。针对两个未实现产业创新案例译码分析得到的新范畴和新面向如表 7 所示。

表 7 对两个未开展产业创新村庄译码分析得到的新范畴和新面向

案例	新范畴	新面向
S 市 S 街道 Y 村	销售压力小（盈利困境） 技术性盈利（盈利困境） 创新欲望不足（创新意识）	品牌知名度高、销售无困难 技术领先、有偿提供技术支持 村民对现状满意、收入稳定
J 市 M 镇 Z 村	技术引进成本更低（技术改进与新产品研发） 销售外包（盈利困境） 担忧政策变化（政策敏锐度） 机械化降低成本（盈利困境） 技术供给渠道（技术改进与新产品研发）	引进成熟技术、发展绿色农业、技术跟进战略 品牌农产品签约基地、不负责销售 担心土地征用、国家政策变化快 机械化作业增收、改变种植观念 品牌农产品公司提供技术支持、依合同标准化生产

注：新范畴栏中括号内为与其存在明显冲突、来自对成功案例译码分析得到的范畴。

通过这两个案例分析得到的新范畴和新面向与前面 4 个成功实现农村产业创新案例得到的范畴和面向进行对比，对之前挖掘出来的范畴和面向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同时，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一般性，对这些范畴及面向进一步地修正和整合，并对范畴的命名进行修正。在第 2 个（W 村）和第 3 个（H 村）案例中，都出现了再增产困难范畴。因此，将技术追赶困境、再增产困难两个副范畴进一步与 B 村形成的主范畴“技术积累”中包含的副范畴整合，形成为“产量增长困境”这一主范畴。由单案例形成的主范畴“农业规模化经营”、“利润增长困境”和新增的主范畴“产量增长困境”，形成新的核心范畴“再发展双重困境”。

将新范畴“乡村精英介入”增加到 B 村质性研究过程形成的核心范畴“创新组织动员”中，将原核心范畴“村庄领导政策感知”变更为“乡村精英政策感知”。修正后，调整的核心范畴、主范畴和副范畴如表 8 所示。

表 8 修正的主轴译码结果

主范畴	副范畴		
	条件	行动/互动策略	结果
产量增长困境 (再发展双重困境)	技术规范性、技术跟踪	技术搜集与学习成本投入、 国外技术引进投入	技术追赶困境、再增产困难
创新组织动员 (乡村精英政策感知)	领导者人格魅力、村级组 织活力	领导者实干精神、乡村精 英介入	组织动员、科技重视程度

注：主范畴栏括号内名词为修正后的核心范畴。

经过对多个案例的整合分析，最终得到 14 个主范畴和 5 个核心范畴。至此，对核心范畴所蕴含的逻辑关系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译码过程和这一逻辑关系，将其用模型图表示（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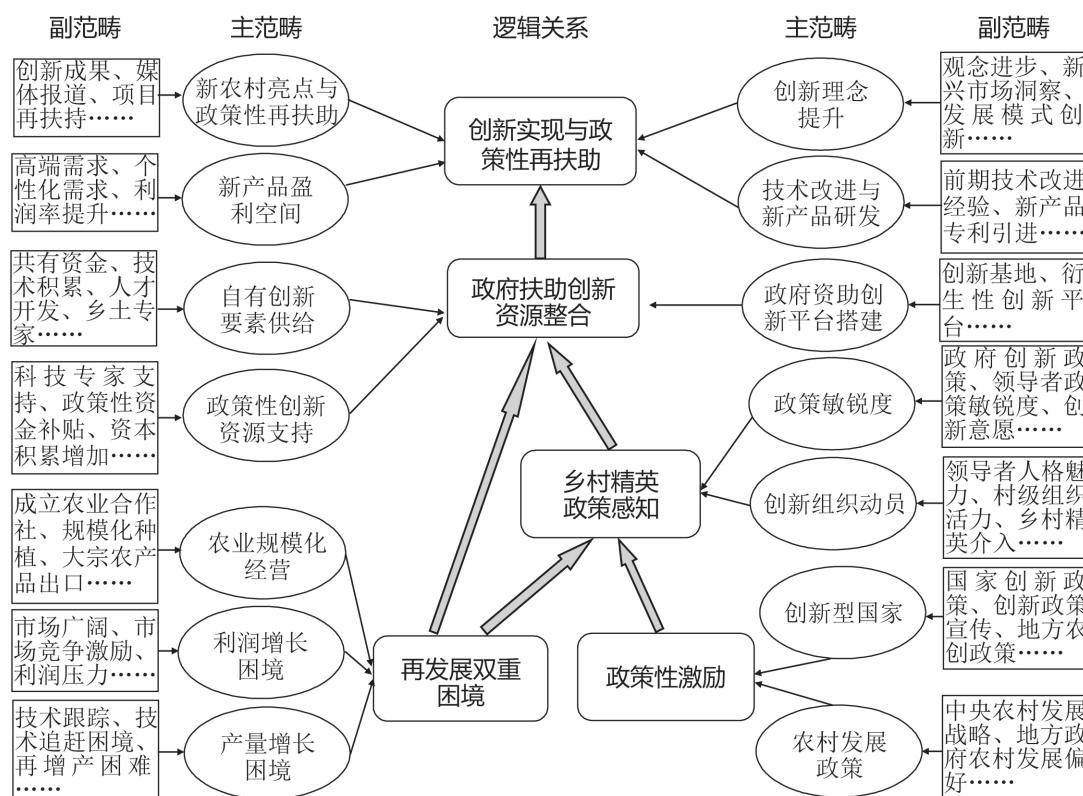


图 1 译码过程及核心范畴蕴含的逻辑关系

注：因副范畴较多，在模型图中只显示了部分副范畴。详细主范畴对应的副范畴见表（4）和表（8）。

五、研究发现与模型阐释

为了探究农村产业创新现象的内在形成机理，本文利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根据对 S 省 6 个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发现影响农村产业创新的因素包括再发展双重困境、政策性激励、乡村精英政策感知、政策扶助创新资源整合、创新实现与政策性再扶助五个核心范畴。从以上五个核心范畴可以看出，政策性因素对推动农村产业创新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在质性研究基础上，将上述五个核心范畴进一步整合为四个阶段，并对农村产业创新形成机理模型阐释如下。

（一）政策激励：创新与乡村发展政策对农村发展方向的指引

根据扎根分析，核心范畴“再发展双重困境”和“政策性激励”反映出经济较为发达区域农村发展的困境及政策性因素对农村发展新方向的激励和指引。其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为：部分现代农业较为发达的村庄，经过多年的努力，基本完成了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但随着农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及以规模求效益模式的逐渐衰竭，因受规模不经济和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影响，村庄农产品产业出现边际产量与边际收益停滞甚至递减现象，形成双重发展困境。为了摆脱发展困境，谋取村庄更好的发展，以村庄领导为主体的乡村精英敏锐地感知到国家政策对创新和农村产业振兴的关注。

在国家创新政策和乡村振兴政策指引下,乡村精英做出以创新谋求村庄产业新发展的方向性决策。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社会创新和农村发展,尤其近年来,相继颁布了若干政策^①。在鼓励全社会创新方面,早在2006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要加大全社会创新力度,力争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2015年,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在加快农村发展方面,2017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以制度创新、政策创新、科技创新为基本动力,激活农业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2018年党的十九大颁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具体部署,成为指导各地方政府推进农村工作的重要依据。

在我国权威型与等级制特征显著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政策对地方政府形成强有力激励^[35]。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迎合中央政策,实现执政政绩^[36],相继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政策。例如,P市自2015年初获批“国家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市”以来,相继制定了《关于加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的意见》(2016)、《“农创P”发展规划》(2016)、《“农创P”二十条》(2016),提出实施“农创+科技、农创+名品、农创+旅游、农创+电商、农创+脱贫”等农民创新创业五大模式,激活农民创新创业潜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②。W市制定了《W市支持创新创业财税政策30条》(2015)、《2018年W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计划》等。

地方政府促进创新及农村发展政策的颁布,对辖区农村产业发展起到有效激励。尤其扶助农村发展的财政补贴政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对落实中央政策,集中优势社会资源支持农村产业发展起到重要政策引领作用^[37],同时也对寻求新发展和争取政策性补贴的乡村精英产生强有力的激励。

(二) 政策感知:乡村精英政策解读与创新决策

乡村精英是指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能带动村庄整体发展的村干部、村办企业负责人、村党支部成员等。近年来,有学者研究发现,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农村产业发展与乡村精英的卓越领导力密切相关^[38]。许多懂经营、善管理并拥有先进生产技术的乡村精英,能发挥示范、引领与带动作用,推进乡村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和促进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提升^[39]。核心范畴“乡村精英政策感知”由“政策敏锐度”和“创新组织动员”两个主范畴构成。在本研究中具有产业创新业绩的四个村庄(B村、D村、W村和H村),乡村精英的创新意识、文化素质、管理能力等都直接影响村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水平^[40]。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颁布关于国家或农村发展的重大政策时,具有创新偏好的乡村精英能敏锐地捕捉国家政策导向,并适时地调整本村发展方向。在实际访谈时,访谈者多次提到乡村精英对政府政策的关注,例如:

“W书记每天新闻要看,一号文件农业的文件,下来镇里的文件他都自己打出来,打出来看。”(访谈记录:B村镇政府驻村干部C20181025)

“L书记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2018年评选),是这里的名人。他一直比较关注政府政策。……农业示范园区建设,也是争取了一些政府补贴建起来的。”(访谈记录:W村市场部经理W20190918)

国家制度(或政策)因素对产品创新作用显著,农村产业创新也不例外^[41]。在各级政府创新与农村发展政策激励下,S省部分具有创新偏好的乡村精英(如B村、W村、D村和H村)提出

① 因近年来我国政府颁布的促进社会创新及农村发展政策较多,在介绍这些政策时仅列举主要几个标志性政策。

② 在中央政策引领下,地方政府制定了许多促进农村发展政策,因政策较多,故而文中每个城市仅列举1—2个政策。且在政策表述中如出现城市名称,出于匿名化需要将以城市首字母替代。如P市制定的政策匿名化处理为《“农创P”发展规划》。

产业创新规划,谋求通过农产品创新摆脱产业经营困境。反观之,Y村和Z村村领导及其他村庄精英,出于各种顾虑,并未在村庄产业寻求新突破方面向创新方面发展^①。Y村和Z村的案例进一步反向佐证了乡村精英创新洞察及偏好对农村产业创新的重要影响。

(三) 政策扶助:村庄创新行动与内外部创新资源整合

核心范畴“政策扶助创新资源整合”由“政策性创新资源支持”、“自有资源供给”和“政府资助创新平台搭建”三个主范畴构成,其逻辑关系是乡村精英通过向政府争取各种创新资源,结合本村积累的创新要素,利用财政涉农项目补贴搭建了农村创新平台,并利用该平台融合各种创新要素开展农产品创新实践活动。

产业创新是一项系统性复杂工程^[42],既需要依靠村庄自身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的种植技术、技术人才、生产资本等,还需要依靠村庄外部(尤其当地政府帮扶资源)的先进技术、人才、资金、优质设备等支持方可成功。地方政府涉农扶持政策可分为优惠类政策(如购机优惠、用水用电优惠、税收优惠等)、补贴类政策(贷款补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和专项扶持政策(如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扶持、特色农产品生产项目扶持等)三类。这三类政策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扶助农村产业创新实现。一方面,乡村精英积极利用优惠类政策和补贴类政策,夯实村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基地。例如,B村依靠地方财政支持,对土壤熏蒸(消毒)、建立了农田自动滴灌系统;W村利用财政补贴资金建设了冬暖式大棚,并安装了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了大棚内温湿度、浇水和施肥智能化控制。另一方面,乡村精英积极争取专项扶持政策,建立了有助于关键农业技术攻关的研发平台。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发现,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创新村庄都建有融合各方资源的农村创新平台(B村建有庄户学院、农民创新创业园两大平台;W村建有绿色循环农业示范园;D村和H村建有与科研院所合作的试验基地),创新平台可以充分与地方政府、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国外客商、专利发明人等交流沟通,使创新要素得以有效整合。根据实际调研资料,梳理出村庄内外部创新资源融合过程(如图2所示)。

通过农村创新平台对村庄自有创新资源、政府及科研院所等提供的创新要素有机整合,实现了试验田、技术人才、研究资金、经济支持等各类要素集聚,并按照一定规则整合、协调各类资源,进而形成有助于创新型农产品研发的体系。

(四) 结果与效应:创新实现与政策对“优势村庄”扩大化再扶助

根据扎根分析,“创新实现与政策性再扶助”这一核心范畴由“创新理念提升”、“技术改进与新产品研发”、“新产品盈利空间”、“新农村亮点与政策性再扶助”四个主范畴构成。农村产业创新的成功实践,不仅缓解了村庄发展困境,还为地方政府带来良好执政的美誉度,提高了地方政府官员执政绩效,为后继争取政策性再扶持资源奠定良好基础。

在当代社会,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经济生产、发展驱动力等都在重构,共同推动着乡村现代化进程^[43]。本文聚焦研究的6个村庄中,除Z村和Y村外,其他4个村庄都成功实现了农村农产品产业创新。例如,B村在南果北种、盆景水果方面,实现了一株四盆技术性突破;W村在智能种植床方面,不仅设计了循环农业种植模式,并且研发出更有利于植物杆腐烂的酶;D村循环生产链,不仅研发出了食用菌新品种,更是形成了绿色生态化产业链;H村蝴蝶兰新品种的研发,使该村在同类产品营销中获得了竞争优势(新品种批发价每株比一般品种多5元左右)。这些村庄创新型农产品的成功实践,有效缓解了村庄利润增长压力,还为绿色农业、循环农业发展奠定了基

^① 在实证调研中发现,Y村和Z村村领导未能提出农产品创新规划的顾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是现在有许多企业专门从事农业新品种培育,农民在农产品创新方面缺乏优势;其二是农产品市场竞争激励,农民自己开发新产品投入大,效益不一定高;其三是即使开发出了新产品,市场不一定认可,销售难度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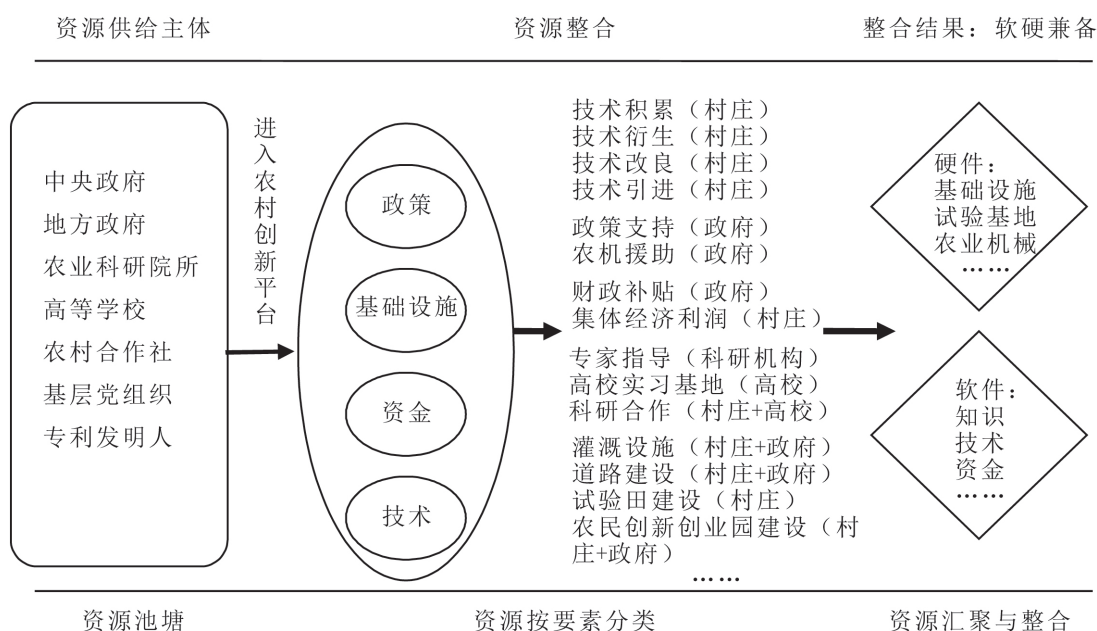


图2 村庄内外部创新资源融合过程模型

础。正如 W 村市场部经理 W 所言：

“我们利用自主研发的智能种植床系统生产的蔬菜，品质好、纯绿色、售价当然也高。现在利用这套系统生产的蔬菜产量有限，主要是针对城市富人区，以会员的方式销售。也就是你看我们怎么种出的菜，看着放心了、满意了再买。”（访谈记录：W 村市场部经理 W20190918）

农村产业创新的成功实现，为村庄美誉度及地方政府官员执政绩效提升都带来了良好结果，也为政策性资源再扶持村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地方政府利用政策资源再扶持产业创新村庄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帮助拓展新产品营销渠道。地方政府利用各种官方传媒机构及政府采购项目，宣传并购买创新村庄高品质农产品，帮助其缓解销售困境。例如，当地政府采购 B 村盆景水果，为高端会议会场布景和食用；W 市 F 区采购 W 村智能种植床生产的绿色蔬菜，作为该区小学生营养午餐的食材。其次，地方政府为了向各地参观考察团展现农产品创新“亮点”村庄良好的形象，拨付专项资金，对村容村貌、基础文娱设施等进行了建设。最后，地方政府为了巩固以创新为“特色”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成绩，拨付专项产业再发展资金，推动创新产业研发活动开展。

在调研过程中，课题小组发现，当颇具政绩特征的创新村庄在各方努力下，获得较高社会知名度时，地方政府会更乐于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资金提升村庄基础设施、现代农业种植园区建设、农民创新创业园区建设、农业科技服务、村容村貌等建设，以更好形象接待各地参观访问团。可以说，乡村精英因产业创新决策和成功实践，为村庄发展赢得了全方位的政策性扶持，促使村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例如，H 村在财政资金帮助下，进一步推动花卉产业链条化发展，扶持智能温室建设；W 村在地方政府进一步资助下，引进以色列技术，建设现代田园综合体项目，使其成为以科技创新为特色的乡村产业振兴示范村。

（五）概念模型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政策性因素主导了整个农村创新过程。乡村精英正是受到激励性政策

的影响，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争取政策性资源支持创新，另一方面努力提升村庄内生发展能力，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农产品创新。农村创新的实现，不仅缓解了村庄产业利润增长压力，更使地方政府官员获得了更好的执政绩效（树立区域或全国性产业发展示范村）。村庄与地方政府之间互利共赢的创新效益，使村庄更容易持续性获得各种政策性扶持。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把整个因政策性因素主导而形成的创新过程称为政策诱致型农村产业创新实现过程模型。模型以先进村庄农产品经营规模化实现后，面临的双重发展困境为起始点，以政策激励、政策优惠、政策补贴、政策项目建设为驱动力，以乡村精英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为主线，描述了由政策诱致的农村产业创新演进路径（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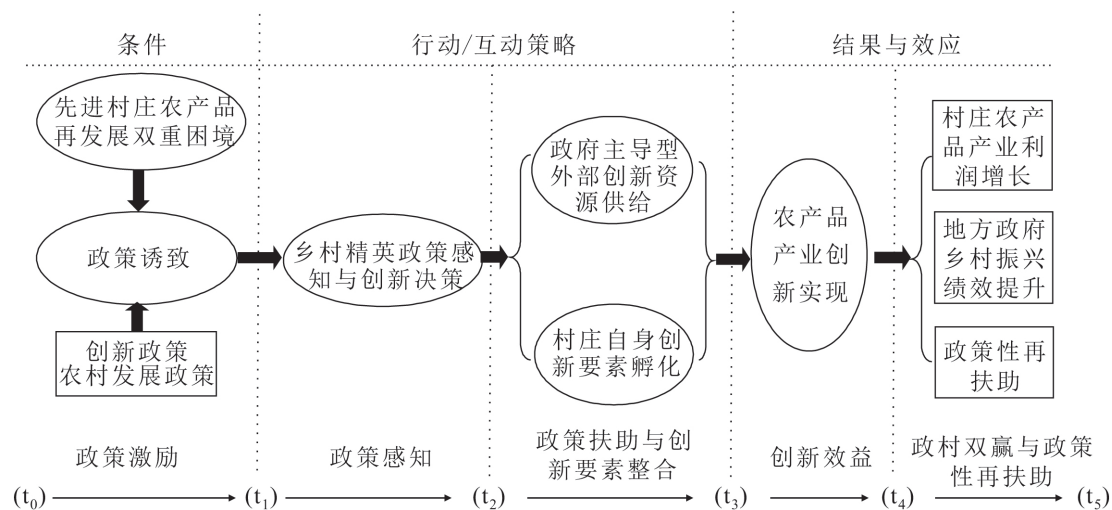


图3 政策诱致型农村产业创新实现过程模型

该模型图可从四个阶段描述政策诱致农村产业创新实现过程。第一阶段：驱动产业创新的内外条件（ t_0-t_1 ）。在起始点（ t_0 ），农产品生产现代化已经完成并经营多年的村庄，受市场竞争和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影响，出现产量与利润双重再增长困境。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及农村发展政策的颁布，对政策敏感度较高的乡村精英形成一种政策激励。第二阶段：乡村精英政策感知（ t_1-t_2 ）。在政府政策诱致下，乡村精英意识到创新是提高盈利能力和赢得新增长点的有效方式，并通过调整村庄产业发展规划，做出产业创新的决策。第三阶段：政策扶持与创新实践（ t_2-t_3 ）。乡村精英为了实现产业创新目的，在利用村庄自有资源的同时，利用争取各类政策扶持的创新资源、搭建创新平台、开展创新实践。第四阶段：产业创新的结果与政府绩效提升（ t_3-t_5 ）。在内外创新要素共同作用下，经过技术改良、生产方式改变、营销模式创新实现农产品创新。农产品创新的成功实践，不仅提高了村庄经济利润和知名度，还提升了地方政府官员执政绩效。地方政府为了更好地打造并宣传乡村产业振兴“亮点工程”，进一步向产业发展有创新特色的村庄注入新的财政扶持性资金，为村庄再创新提供了新机遇。

六、总结与讨论

我国农村地区产业（农产品）创新现象何以发生？现有的文献对这一重要现象尚无逻辑一致的解释。本文通过对东部发达地区S省先进村庄的实证调研，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农村地区农产品创新形成的驱动因素和创新过程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归纳。研究发现，先进村庄再发展双重困境、

政策性激励、乡村精英政策感知、政策扶助创新资源整合、创新实现与政策性再扶助五个核心范畴对农村产业创新具有显著影响。根据核心范畴、主范畴及调研资料,进一步发现政策性因素是推动农村产业创新实现,并进一步激励持续创新行为的关键。总体而言,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本文通过对实证调研材料的质性分析(扎根理论),发现政策性因素是诱致农村产业创新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这一学术发现,构建了政策诱致型农村产业创新实现过程模型,并对模型中各因素间相关关系作了系统论述,该模型丰富了中国语境下对农村产业创新现象的理解。本文构建的政策诱致型农村产业创新模型与发端于西方国家的产业创新模型框架(如创新网络系统模型、区域产业创新系统模型、多部门协同创新模型等)不同的是,现有理论按照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认为经济利益是驱动创新资源聚合和产业创新成功实践的关键因素。而本研究认为,在权威型与等级制特征明显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政策注意力向农村和创新方面的转移,对农村产业创新决策、资源筹集与整合、新产品研发及新产品营销等都产生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构建的政策诱致型农村产业(农产品)创新形成机理模型,能较好地说明政策性因素对我国农村地区产业创新产生重要影响。该模型对探讨强政治场域和科层制特征明显的社会环境下的农村创新问题具有一定理论价值。

第二,本文研究发现,在权威型特征明显的社会环境下,中央政府政策主张会间接(或隐性)地带动地方政府资源要素向有创新意愿的村庄聚集,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创新要素匮乏的难题。该观点与 Mahmood、Rufin 和 Jones 等学者提出的政府通过直接(或显性)政策(如创新补贴政策、创新税收减免政策等)激励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的学术观点存在差异。在实证调研过程中发现,地方政府在帮扶农村产业创新过程中,并未使用研发补贴、高新技术研究税收减免和研发加计扣除税收减免等以创新为指向的扶助政策,而是以间接(或隐性)的方式(如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机补贴、科技支农、农民创业项目、扶贫项目等),为村庄创新实践提供资金、设备、科技人才等方面支持。这种不以创新为指向的策略性政策扶助方式,有效弥补了农村产业创新方面的资源要素短板,帮助村庄实现创新目标。地方政府的这种策略性扶助农村创新的行为,既反映了中央政策注意力向农村倾斜对地方政府助农行为的强力激励,也折射出目前政府创新扶持政策对农村集体经济或互助性经济组织(农业合作社)的匮乏和效力有限性。

第三,本研究发现,乡村精英践行产业创新的愿望和村庄产业创新潜在能力的统一,是农村产业创新发生的关键因素。学者 Acemoglu 和 Zilibotti (1999) 使用“优势企业扶持”的概念描述了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产业政策特征^[44]。事实上,在我国多年来政府扶持产业发展实践中,始终贯穿着“优势扶持”的政策逻辑,该模式被学者顾昕等称为“挑选赢家”^[45]。具有创新偏好的乡村精英,通过长期与地方政府的互动经验(如B村村委书记是Q市人大代表、W村村委书记L是W市人大代表),精准识别地方政府急于打造区域性“样板村庄”和“特色村庄”,并习惯性地利用公共资源“扶助优势村庄”或“扶持赢者”的行为逻辑,希望以产业创新为突破口,实现促进村庄收入增长、完善村庄基础设施、提升地方政府执政绩效等多重目标。因此可以说,部分乡村精英对权威型政治格局下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精准预判,是农村产业创新决策和践行的关键。

将乡村精英创新偏好与村庄潜在创新能力的统一作为推动农村产业创新发生的关键因素,事实上也可以解释为何在相同的政策场域下,部分村庄实现了产业创新,而大多数村庄并未谋求通过创新实现新发展。在农村产业创新实践中,乡村精英决策力与创新偏好、乡村精英与地方政府官员长期良性互动关系、村庄既有产业优势、村庄自有创新资源储备等,都是农村地区非常稀缺且重要的创新要素。在调研地区S省,大部分村庄事实上还从事传统农作物生产,缺乏地方政府“优势村庄

扶助”的任何“优势”和“特色”，缺乏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乡村精英引领，自然也就没有条件开展产业创新活动。即使有些村庄在乡村精英与地方政府互动良好、村庄既有产业优势明显、村庄区域知名度较高等条件均具备状况下，由于乡村精英权衡村庄比较优势，选择了其他发展路径（例如 Y 村和 Z 村案例中，Y 村引进国外成熟技术发展绿色农业，Z 村与品牌农产品公司深度合作拓展生产规模），也就失去了从事产业创新的可能。

当然，本研究作为对农村产业创新模型的探索性研究，其结论还具有局限性。第一，本文只关注了农村农产品创新的形成机理，而未对农村其他产业（主要是非农产业）创新现象展开分析。但事实上，手工加工业（如手绘艺术彩陶）、非农企业（如箱包设计与生产）等也是农村产业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乡村产业振兴也有很强带动作用。第二，本文构建的政策诱致型农村产业创新模型是通过深入访谈，以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模型中各因素对农村产业创新到底产生何种强度的影响，在本文中并未展开量化分析。

虽然存在以上缺憾，但作为一个探索性研究，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深入剖析农村产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并进一步提出了政策诱致型农村产业创新实现过程模型。诚然，农村社会及产业创新有着复杂多样的形态，基础性资源及乡村精英偏好的不同导致农村创新现象的作用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人们的行动总是遵照特定的行为理性。通过挖掘农村产业创新的形成因素及内在作用机理，加深对政策性因素在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农村产业创新驱动因素的理解，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1] [奥]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何畏, 易家详,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2] 张来武. 论创新驱动发展[J]. 中国软科学, 2013(1).
- [3] Lee, K., C. Lim. Technological regimes, catching-up and leapfrogging: Findings from the Korean industries [J]. *Research Policy*, 2001(3).
- [4] Jain, V. Agriculture innovation systems in Asia: Towards inclusive rural development[J].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0(4).
- [5] 郭庆宾, 刘琪. 城市资源集聚能力研究进展述评[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
- [6] 范剑勇, 冯猛, 李方文. 产业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世界经济, 2014(5).
- [7] 杨洋. 农村集体经济振兴的蕴含价值、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J]. 农村经济, 2020(9).
- [8] 钱忠好, 牟燕. 乡村振兴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4).
- [9] 张玉林. 21 世纪的城乡关系、要素流动与乡村振兴[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 [10] 肖滨方, 木欢. 寻求村民自治中的“三元统一”——基于广东省村民自治新形式的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16(3).
- [11] 汪洪涛, 宋朝阳. 我国提高农村生产力的实践探索 and 理论创新——基于马克思主义生产社会化理论的分析[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 [12] 涂正革, 陈立. 技术进步的方向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3).
- [13] Neumeier, S. Why do social innovations in rural development matter and should they be considered more seriously in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Proposal for a stronger focus on social innovations in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J]. *Sociologia Ruralis*, 2012(1).
- [14] 佟家栋, 彭支伟. 从“干中学”到“加工中学”——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技术外溢与自主创新[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6).
- [15] 曹希敬, 胡维佳. 熊彼特及其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关于创新-经济周期研究的述评[J]. 中国科技论坛, 2014(11).

- [16] Dias, M. F. P., E. A. Pedrozo, T. N. da Silva. The innovation process as a complex structure with multilevel rules[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14(5).
- [17] Tedeschi, G., S. Vitali, M. Gallegati. The dynamic of innovation networks: A switching on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14(4).
- [18] 尚洪涛, 宋雅希. 中国民营企业创新补贴政策效应的动态评价[J]. *科学学研究*, 2020(6).
- [19] 杨蓉, 刘婷婷, 高凯. 产业政策扶持、企业融资与制造业企业创新投资[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8(11).
- [20] 孙莹, 顾晓敏. 减税政策对民营小微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J]. *统计与决策*, 2020(13).
- [21] Dawson, P., Daniel, L. Understanding social innovation: A provisional framework[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0(1).
- [22] Bosworth, G., F. Rizzo, D. Marquardt, etc. Identifying social innovations in European local rur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J].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6(4).
- [23] 李凌汉. 影响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因素及实现路径——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J]. *观察与思考*, 2020(12).
- [24] Wu, J., S. H. Zhuo, Z. F. Wu.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rur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7, 121.
- [25] Perez, 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1).
- [26] Stefan, N. Social innov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 Identifying the key factors of success[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17(1).
- [27] 涂俊, 吴贵生. 基于 DEA-Tobit 两步法的区域农业创新系统评价及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4).
- [28] García, G. A. G., I. Gutiérrez-Montes, H. E. H. Núñez, etc. Relevance of local knowledge in decision-making and rural innovation: A methodological proposal for leveraging participation of Colombian cocoa producer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0, 75.
- [29] Kovács, J. K., E. V. G. Nemes.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 innovation in rural regions: Some Hungarian case studies[J]. *Studi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6(1).
- [30] 万幼清, 王云云. 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企业竞合关系研究[J]. *管理世界*, 2014(8).
- [31] 白俊红, 蒋伏心. 协同创新、空间关联与区域创新绩效[J]. *经济研究*, 2015(7).
- [32] Yin, R. K. 案例研究: 设计与方法(中文第2版)[M]. 周海涛, 李永贤, 李虔,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 [33] [美] 安塞姆·斯特劳斯, 朱丽叶·科尔宾. 质性研究概论[M]. 徐宗国, 译.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97.
- [34] Corbin, J., A. Strauss.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Procedures, canons and evaluative criteria[J].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90(1).
- [35] 周亚越, 虞昊. 官僚场域中偏正结构形成的权力运作分析——基于浙江省H市X区秘书科的考察[J]. *公共管理学报*, 2018(3).
- [36] 尚虎平, 韩清颖. 我国政府独特绩效产生的原因及其价值——面向2007—2017年间我国172个政府独特绩效案例的探索[J]. *政治学研究*, 2019(3).
- [37] 苗文龙, 何德旭, 周潮. 企业创新行为差异与政府技术创新支出效应[J]. *经济研究*, 2019(1).
- [38] 郭苏建, 王鹏翔. 中国乡村治理精英与乡村振兴[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
- [39] 李凌汉. 农村合作社驱动农业技术跨区域扩散: 逻辑机理、影响因素与实践探讨[J]. *湖湘论坛*, 2021(1).
- [40] 杨婵, 贺小刚. 村长权威与村落发展——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J]. *管理世界*, 2019(4).
- [41] 王炳成, 李洪伟. 绿色产品创新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5).
- [42] Jin, C., X. Yin, M. Liang. Holistic innovation: An emerging innovation paradig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Studies*, 2018(1).

- [43]桂华. 面对社会重组的乡村治理现代化[J]. 政治学研究, 2018(5).
- [44]罗晓辉, 胡琰琰, 万丛颖. 结构趋同与“优势企业扶持”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来自于地方政府同质化竞争的解釋[J]. 管理世界, 2018(12).
- [45]顾昕, 张建君. 挑选赢家还是提供服务?——产业政策的制度基础与施政选择[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4(1).

Policy Induced: An Explanation Framework of Rural Industrial Innovation

— Multi Case Grounded Analysis of Rural Agricultural Product Innovation in S Province

LI Ling-han, LOU Cheng-wu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oriented country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re has appeared industrial innovation spontaneously formed by villagers in rural areas.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lacks the exploration of driving factors and multi-factor path of rural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riving factor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in rural industries, this paper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ypical villages (6 natural villages) and used grounded theor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five core categori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romoting rural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 five core categories are: double dilemma of redevelopment, policy incentive, policy perception of rural elites, integration of policy-based innovation resources, innovation realization and policy-based re—support. Bas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rural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the logical evolution path by using in-depth interview.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internal logical mechanism model of policy induced rural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is valuable for the study of the concept model of rural innovation, the formul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farmers'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olicy incentives; industrial innovation; policy induced; rural elite

(责任编辑 周振新)